

“上译”70年：“声”入人心，“译心”不改



▲上译厂推出的“唯优声训营”活动吸引年轻人。



▲乔棣(右)为新一代配音演员周宇说戏。

本报记者许晓青

近日,上海电影制片厂迎来70华诞,与新中国同龄的不仅有上影厂的电影摄制业务,还有“声”入人心的译制片事业。

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是1949年设立的上影厂翻译片组。1957年4月,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70载光阴,“上译”共翻译制作外国电影1500多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从上世纪50年代的《乡村女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子复仇记》,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追捕》《佐罗》《幸福的黄手帕》,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大篷车》《虎口脱险》《茜茜公主》,直到进入新世纪银幕上的《哈利·波特》《蝙蝠侠》《奥特曼》,还有《功夫熊猫》《愤怒的小鸟》等都有上译人的配音,近期热映的《冰雪奇缘2》更是凝结了上译人的心血。

薪火相传

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九旬高龄的新中国第一代译制人、著名配音导演苏秀,在自己的新居朗诵起为上影70周年专门撰写的译制小故事。

“我亲爱的战友,我亲爱的‘大学’。”1950年加入“上译”的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大事——译制外国电影,她把“上译”当作引导自己人生的“大学”。

在苏秀和几代上译人眼里,“上译”的灵魂人物无疑是已故的首任老厂长陈叙一。“他不仅仅是厂长、翻译家,更是一名语言艺术大师,精通中外文化。”一名“90后”编译人员说。

“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是陈叙一的名言,直至今日仍是几代上译人的工作要诀,就好像武侠片里众人求之不得的秘籍一般。

老一辈上译人的言传身教影响深远。有人曾亲眼见到邱岳峰为《大独裁者》配音时用绳子扎紧自己的肚子,为的是保持气息连贯。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配音质量,一些老演员还曾在身上压上沉重的箱子,以达到“气喘吁吁”的效果。

苏秀忘不了和“战友”们合作的日日夜夜,但这些年“战友”还是走了不少。20世纪80年代初,先是邱岳峰走了,后来于鼎、毕克、尚华、李梓、赵慎之等也相继走了。就拿观众最难忘的《虎口脱险》来说,其中就有尚华、于鼎的精彩表演,苏秀说,接到导演任务时,还以为是陈叙一故意为难她,后来终于明白,老厂长是要锻炼她。

这部作品留下一个中国译制片史上的经典译法:将“Tea for two”(双人份的茶)翻译成“鸳鸯茶”而非“情侣茶”或其他。

苏秀说,这都是陈叙一的创造发明。

中国的译制片行当偶尔也会请“外援”(非专业配音演员),比如上影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就被请来为《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配音。孙道临反复琢磨原著,探索“王子”富有“诗性”的发声,这也成为后继者效仿的模式。

上译厂的“中生代”代表人物乔棣坦言,“1970年第一次接触译制片,算起来至今参与译制和配音的起码有上干部了,我们所配的每一个角色,都像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身心全部融入进去,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和个性色彩。每个角色都付出很多心血。”

乔棣依稀记得20世纪80年代,上译厂筹备译制《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当年着墨颇多的人物沃伦斯基性格复杂,这个角色“倒逼”着乔棣专门重读原著,最终乔棣仿佛和沃伦斯基一样“大彻大悟”。反映在片中配音,他配出了一种彻心彻肺的笑声。

著名配音演员刘广宁说,配音的要诀,不在于声音的好坏,而在于能不能做到“以声传情”。

薪火相传,人们很高兴地看到,曹雷、童自荣、刘广宁、乔棣、丁建华等著名配音演员近年来依然活跃在配音舞台上,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也很活跃。

新“译”代

迪士尼大片《冰雪奇缘2》在内地上映不到两周,票房已超过6亿元人民币,短短时间超越了2014年《冰雪奇缘》在内地的票房总和。在《冰雪奇缘2》的字幕位置,可以看到“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这一行字让不少对配音感兴趣的观众兴奋不已。

上任整一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张拯是一名干劲十足的“80后”。十多年前,职业录音师张拯放弃了民营录音棚的优厚待遇,投身上译厂。“第一次来这里,就惊呆了,亚洲顶级的录音设备不能沉睡在这里,我的心动了,非常想干一番事业。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很有成就感。”

2009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上海电影集团打造的全产业链已具雏形。当时译制厂就凝聚了一批活跃的“80后”,很快“90后”也登场了。

最近在《冰雪奇缘2》的中文字幕版及配音版中,人们看到了张悠悠的名字,她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专职电影文本译者,是译制片行业的“新译”代。

今年4月,在上海首家电影主题酒店——银星皇冠假日

献给我的“大学”

苏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从前谁也没有听说过翻译片,更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搞翻译片。怎么能让中文台词和原片演员的口型一致,就成了第一道要迈过去的坎。

听说,曾经用过一种掐秒表的方法。列宁这段话,用了5秒钟,中文台词也说5秒。可还是不行。我5秒钟能说15个字,可体育解说员能说24个字。

等到我1950年9月进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配音雏形。那就是口型员对着原片的口型,读翻译的剧本。那真是要功夫啊。必须眼快,看着陌生的翻译的剧本,马上和原片速度一样读出来。还要手快,要随手给多出来的字,画上记号。然后念下句,如果下句少三个字,要念“1、2、3”。否则,中文台词跟原片台词的位置就错开了。

所以,孙道临给我起外号,叫“残酷的123”。例如“今天的天气多么好啊,咱们去野餐吧。”前面9个字,后面6个字。可原片是4个字,9个字。我就要念成“今天的天,咱们去野餐吧123”。根据字数可以改成“天多好啊,咱们到郊外去野餐吧”。中文字多的时候,不能把主要意思删掉,需要加字的时候,不能让人觉得累赘。

有一次遇到一句台词——“靴子里有盖灯”。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灯怎么能放在靴子里?靴子会不会翻错?翻译说:“绝对不会错。”直到后来,看到画面中的人从靴子里拿出一把手枪,我们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手枪的牌子。就像我说:“我抽屉里有白猫”,我指的是我抽屉里有白猫牌子洗衣粉,而不是有一只活的猫。

由于我们的精工细作,台词与口型丝丝入扣,有一个山东的解放军战士写信来问我:“你们的影片,是按台词修剪过的吗?”我赶快把信拿给翻译们去看:“这是对你们多么高雅的赞扬啊。”

老厂长陈叙一为了提高剧本的质量,为了人才能快速成长,订立了一种制度叫“编辑制”。

就是一个年轻翻译翻的剧本,往往派一个有经验的老翻译当剧本编辑。由编辑负责修改剧本,回答导演提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小翻译,导演和口型员也会一块参与分析剧情、斟酌台词。有时,你想起一句好词,他受到启发,想起一句更妙的,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忘记了吃饭。

大家都从中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我们上译厂的“大学”特有

酒店举办的沙龙活动中,张悠悠等新一代翻译从幕后走到台前。面对前辈的成绩,她们显得低调谦虚,甚至有些诚惶诚恐。

张悠悠说,比如把“Tea for two”(双人份的茶)翻译成“鸳鸯茶”,把“Boss”翻译成“头儿”,这些“神操作”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在人人都在讲“二次元”的今天,我们还是希望继承传统,在传统中创新。

如今上译厂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二次元”声音。比如周帅为《冰雪奇缘》系列中的艾莎配音,同时又是某大型游戏中花木兰、武则天等的“声音形象”;张琦也为迪士尼动画大片配音,同时是国内大型游戏的主要“声音形象”。此外,青少年熟悉的“巧虎”等形象也有“上译版”的配音。新“译”代往往也是导演、配音兼顾,不少是综合型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译制厂的新“译”代如今也有了大批固定“粉丝”。每每有译制片上映,“上译观影团”格外活跃,专场放映总是一票难求。一些小观众的家长在网上点赞:“我们需要译制片”。

“功夫熊猫”配音专业户、上译厂副厂长刘风说,新一代的成长为上译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世界在变,“译心”不变

2019年,多场世界瞩目的电竞赛事在上海举办,按照电竞行业的大赛活动模式,为游戏人物配音的重量级演员也会亮相比赛现场。每当主持人介绍一位游戏人物的幕后“声音”登场,都会引发线上线下成千上万的“粉丝”为之喝彩、点赞。

在人们的欢呼背后,“上译”的译者们仍在埋头苦干。“世界在变,市场在变,译者的心没有变。”张拯说。

目前的上海电影译制厂不仅每年完成数十部院线大片和“批片”(非首映当年引进的影片)的配音工作,在紧张的译制进程中,上译厂还连续多年出色完成国家交付的影视译制工程及相关文化交流培训项目。

“外译中”仅是上译厂目前业务的一个类别,“中译外”在



▲新中国第一代配音导演、配音演员苏秀在录音棚内。本组照片均由上译厂供图

的“课堂”。

记得有一天上午是录日本电影《雾之旗》配音的最后一个班。中午陈厂长要赶着直接从厂里去机场。赵慎之一场戏要又哭又喊,她被误认为杀人犯。于是配检察官,当中插几句话。老赵准备得很充分,可是,老赵不是口型不对,就是台词说错,真是急得我“七窍生烟”。一怕老赵这样的激情戏,录多了激情就没了,更怕误了老陈的行程。

下一场戏是毕克和小丁(丁建华)的,主要是毕克。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像往常那样,听两遍有声,听两遍无声,再录。后来,只给他们听一遍有声,就直接录音。终于,把时间抢回来了。

一名工作人员说:“苏秀啊,你实在把毕克逼得太狠了,给他买一根人参补补吧。”

现在我回忆起来,老赵尽管“吃螺蛳”(指说错台词),但配出来的戏还是非常有味儿。现在,老毕、老赵、慎之,他们都不存在了。我们曾经在一个团队里战斗过的,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好想你们呐。

(注:作者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一代配音导演、配音演员,写于2019年11月16日“上译厂70华诞”之际)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正在变得更加重要。2019年,上译厂还完成了热映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的字幕“中译外”等项目。邀请在沪外籍人士为中国影视作品配音,也已成为现实。

“与10年前或5年前相比,我们对译制的前途变得更有信心,因为‘声音产业’究竟是什么,究竟要怎么做,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张拯说。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英语在中国社会的普及,传统译制片的主要市场式微,更多中青年观众选择“原版片+字幕”的形式观看电影;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带动民营声音产业崛起,企业和平台进入快速扩张期。有的企业专注翻译、生产字幕,有的则灵活多样地组织民间配音力量开展活动,也有部分业余“声音”走上大银幕。

“我们看好百花齐放,同时希望把‘上译’做得更好,市场化是大方向,上译人也要学会在市场大潮中摸爬滚打,而且我们定力十足、初心不改。国家任务和市场业务两不误。”一身挑着上译厂“厂长”和“公司总经理”两个职务的张拯正在为未来的上译厂拟订更宏伟的发展规划。

近年来,市场化的声音产业轮廓日益清晰,其中既包含动漫、游戏、网络社区等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增长极,也包括配音技巧训练等培训行业。让上译人欣慰的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译厂就率先尝试面向大众提供配音培训,造就了一批新“译”代的配音人才和配音爱好者。如今,上译厂已拥有“唯优声训营”等市场和口碑俱佳的培训平台,累计培养百余名人才,不少已晋级专业配音行列。

什么是属于未来的“声音产业”?老一辈艺术家用富有特色的声音艺术,为观众“配”出各种属于未来的可能性。去年,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丁建华等相聚在一起,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重新配音,时隔多年艺术家的声音宝刀未老,连苏秀也重回录音棚“试验”了一把。不久的将来,这部“老声新配”的动画大作有望与观众见面。

当九旬高龄的苏秀畅想未来时,她坚持认为,“在这个属于‘地球村’的时代里,人们对于译制片的渴望不会停滞”。



走读

韩浩月

去了两次温州,琦君成为避不开的一个人物。琦君是著名的华文女作家,原名潘希珍,以写散文见长,多年前一部名为《橘子红了》的电视剧,是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但并没有多少人因此更了解她。多年以来,琦君是一位濒临被遗忘的人物。

但温州人没有忘记她,为她建纪念馆、文学馆,出版纪念文集。也从传记作家李辉、主持人白岩松等人那里,陆续了解了琦君的一些故事,他们把琦君写进文章里,演讲稿里,让琦君的名字从温州出发,抵达更多人的视野。华裔著名作家张翎以故乡温州为背景,写了不少中长篇小说,也出版过一本与故乡有关的散文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温州,已经变得非常具体化。

最近这次遇见琦君,是11月底,与温州人、著名书评人绿茶约好了在琦君文学馆碰面。我到达的时候,绿茶已经端坐在文学馆面前开始画他的小画。琦君文学馆是琦君小时候居住过的宅子,曾经的大宅多数被损坏了,剩下的核心部分被保护了起来,修缮后成为寻找琦君踪迹的重要场所。

琦君1917年出生于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庙后,在瞿溪潘宅度过童年,2006年去世于台北。离开内地之后的琦君,写下了大量怀念故乡温州的文字。离故乡越远的人,越是故乡的景物与往事记忆清晰。未能落叶归根,将骨灰葬于故乡山水间,或是琦君的一个遗憾,但故乡人对她的惦念,还有对她名字的呵护,会让她的在天之灵感到慰藉。

我在琦君纪念馆与琦君塑像合影,一幅幅仔细观看她的生平重大事件与影像,个多小时之后,绿茶已经在馆外画下了文学馆的全貌:一栋古朴而大气的南方木质建筑,带有时光与烟雨的气息,旁边是一棵无比高大的白玉兰树,是琦君童年时亲手种下的,算来已经差不多有近百年的树龄。这棵大树分外葱茏,生机盎然,让它的四周都充满活力。如今,琦君文学馆已成为三溪中学校区的一部分,这棵白玉兰树,要守护每天往来这里的学生成长,它必须年轻,它无法不年轻。

绿茶让我在他画的小画上签名留念,想了想,写下了这样三行字,“又来温州,绿茶故乡,遇见琦君”。我喜欢“遇见琦君”这样的说法,仿佛她没有故去,依然会在文学馆的某个房间里写作,或者在瞿溪山水的某一处游玩。

琦君已经是温州的一张文化名片。推广琦君这张文化名片的人,名字叫周吉敏,她也是一位作家,但在决心投身于对琦君的推广与保护事业的五年时间里,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专心只做与琦君有关的事,呼吁社会各界参与建设琦君纪念馆、文学馆,设立与颁发“琦君文学奖”……都是她默默地在背后做相关的工作,以极少的人手,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无视怀疑与误解,只为琦君不被时代洪流淹没。

第一次来温州差不多是两年前,也是吉敏带我们走近琦君。记得那是夏天,我们一起拜访刚开放不久的琦君纪念馆。纪念馆位于温州瓯海区泽雅镇的庙后小学,这所小学是琦君父亲捐资建设的,小学前几年搬走之后空了下来,便改建为琦君纪念馆。

泽雅镇也是吉敏的家乡,这个地方的景色与其名字一样美。虽然地理位置非常偏僻,但造纸传统却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这里的造纸技术,据说比《天工开物》所记载的更为原始、严谨,并且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可以行销到各地的纸店,甚至远销海外。吉敏写过一本名字叫《泽雅古道》的书,也写过一篇关于泽雅造纸的长篇散文,但她最开心的事,仍然是与琦君有关的事情。

记得坐车前往泽雅琦君纪念馆的路上,就在我们一路赞叹路边景色之美到达一个情绪巅峰的时候,车子猛地转了一个大弯,琦君纪念馆的石雕名牌便出现在了眼前。琦君纪念馆算是处在在一个“风水宝地”了吧,站在纪念馆门前与院中的时候,无论往哪个方向看,视野里出现的,都是令人舒适愉悦的大自然。

两次来温州,和温州朋友聊天,琦君永远是重要的话题之一。我们谈论她书里的温暖,还有她在写下对父母美好记忆时猝不及防出现的伤感。琦君在四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双亡,她书里所写到的父母,其实是她的伯父伯母,虽然伯父伯母给予了她亲生父母般的关爱,但避免不了还是隐约有“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晓得琦君在写作时是如何处理自己童年际遇留下的阴影,反正在她绝大多数的作品里,读者看到的,永远是那位深情的、宽容的、坦然的女孩琦君、少女琦君。

但我读琦君,却时常能从她简洁的文字里,发现那些隐藏在海面之下冰山般寒冷而尖锐的隐伤。在一篇名为《金盒子》的名篇里,她写下了哥哥与弟弟的离世,写下了与双亲永别的痛苦,“暗淡的人间,茫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蹒跚独行……”琦君就是这样,在自己貌似平淡的文字里,埋下几句话,等待那些与她有着相似命运的读者,读完之后怔怔地呆立原地,陷进她无意流露的忧伤里。

我一直觉得,琦君是一位骨子里很忧伤的作家,只是她并不愿意用忧伤来打动读者。“虽然她的童年充满了忧伤,但她总把美好的写给少年读者,让孩子们读她的书开卷有益”,这是作家林海音评价琦君的话。但真实的琦君,究竟是什么样子,她的一生,有没有一部好的传记作品可以翔实地记述下来?多少都令人有点好奇。琦君写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经历,我想读到那些她没有写出的故事。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愿望,我在温州才会产生时能遇见琦君的错觉。这次在温州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看到远山如黛,那一刻内心很安静,琦君在温州时,一定也这样远望过,要在她居住的屋顶,要么在她种的白玉兰树下。看到这样的景色,听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那正是与琦君相遇的最好时刻。



▲书评人绿茶手绘的琦君文学馆。

遇见琦君